

中国特色文化与特色产业研究丛书

主 编 范建华

副主编 江 克 李 春

节庆 文化与节庆产业

◎ 范建华 郑 宇 杜星梅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节庆 文化与节庆产业

◎ 范建华 郑 宇 杜星梅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节庆文化与节庆产业 / 范建华, 郑宇, 杜星梅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4
(中国特色文化与特色产业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2-1825-8

I. ①节… II. ①范… ②郑… ③杜… III. ①节日—
文化产业—研究—中国 IV. ①G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3562号

策划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毛 雪

陈 曦

责任校对: 何传玉

装帧设计: 刘 雨

节庆 文化与节庆产业

◎ 范建华 郑 宇 杜星梅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17千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825-8

定 价: 56.00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0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中国特色文化与特色产业研究丛书

主 编 范建华
副主编 江 克 李 春

目录

绪 论 | 001

上编 传统文化和节庆文化

第一章 节庆的起源与演变 | 027

- 一、节庆溯源与远古形式 | 027
- 二、节庆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 039
- 三、现当代节庆嬗变 | 057

第二章 节庆的分类 | 062

- 一、以节庆活动形成的民族构成与其生产环境关系划分 | 063
- 二、以节庆活动产生的功能性作用划分 | 074

第三章 节庆的民族分布与区域分布 | 106

- 一、节庆的民族分布 | 106
- 二、节庆的地域分布 | 142

下编 现代节庆与节庆产业

第四章 节庆的演化与异化 | 173

一、历史演进中的传统节日演化 | 174

二、现代变迁中的节庆异化 | 190

三、节庆文化与节庆产业的辨析 | 207

第五章 现代节庆的分类 | 223

一、自然风光类现代节庆 | 223

二、历史文化类现代节庆 | 227

三、民风民俗类现代节庆 | 235

四、工业产品类现代节庆 | 238

五、农业产品类现代节庆 | 241

六、商业贸易类现代节庆 | 246

七、饮食特产类现代节庆 | 252

八、旅游会展类现代节庆 | 254

九、文学艺术类现代节庆 | 261

十、影视传播与科技创新类现代节庆 | 268

十一、体育休闲类现代节庆 | 274

第六章 现代节庆活动组织策划与反思 | 281

一、现代节庆活动的要素与组织策划 | 282

二、现代节庆活动的策划组织实施的个案与经验 | 294

三、现代节庆活动运作中的误区、建议与反思 | 315

参考文献 | 326

后 记 | 340

绪论

节庆是世界各地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事项。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节庆活动，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的某种突破和变奏，是人们重要的情感寄托和精神信仰的表达途径，而且还是特定共同体周期性社会动员与群体整合的通常方式。传统节庆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是保障民族绵延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传统节庆植根于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之中，是民族精神、民族信仰、民族习惯、民族情感、民族生计方式和民族思维定式等特质的集中外化表达。传统节庆以其历史传统的持续再现、特定时空的周期性运转、文化符号的高度集中、信仰因素的参与作用、共通情感的集体欢腾、文化特征的强烈显现等要素的综合作用，让人们从中获得区别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既是“别样的、短暂的”，但同时又是历久弥新的深刻体验。

全世界的节庆类型复杂、内容多样，它们至少关联着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岁时民俗、生产祭祀、情感寄托、英雄崇拜、宗教信仰、经济贸易、文化交往等多个方面。种类繁多的节庆文化不仅是各民族历史的积淀结晶，而且，作为活形态的民俗活动，它们还总是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地诞生、延续、流变、发展以及消亡和再生着。特别是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在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加速的过程中，我们愈来愈频繁地看到节庆文化的相应急遽变化：一些传统节庆被持续地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些新兴节庆蓬勃发展，一些外来节庆越来越趋于流行，一些原本从属于其他产业的专题节庆被创造，当然也有一些节庆也面临着



消亡的危险……其间，参与节庆、体验节庆、享受节庆乃至消费节庆，便构成了现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

当然，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节庆活动的传统功能和价值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们除了延续以往常见的聚会、娱乐、祭祀、交友等通常功能之外，其重心正在向为文化消费服务转变。简言之，当代正在经历一个从节庆文化到节庆经济，从节庆经济到节庆产业的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节庆能够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地方文化建设、文化品牌打造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全新作用。它们已经被视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提高一地一民族对外形象的重要资源。而充分挖掘利用传统节庆文化资源，创新节庆活动方式，设计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节庆活动，便成为当下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提升当地文化品牌的有效方式。顺应这一趋势进一步来看，一方面，实现节庆产业的可持续和科学发展，便意味着不仅能够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国民经济建设的增长，而且还能为实施对外文化贸易战略服务。然而，另一方面必须重视的是，面对当代经济性节庆活动层出不穷、愈演愈烈、鱼龙混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不仅需要运用行政制度、组织调适、社会文化引导等手段，针对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管理、导引和规范，而且更需要学术界从理论上予以高度关注，以厘清相关认知的误区。

—

节庆是一个非常综合和复杂的文化概念。它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形成了某些约定俗成的饮食风尚、仪式庆典、民俗风习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神话、历史传说，毋庸置疑地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也正是由于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得研究“节庆文化”的路径多种多样，对其

所涵盖的不同内容的切入和不同视角的强调，便产生了诸多认知与解说方式。

在中国，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作为节庆主导形态的岁时节庆主要属于民俗范畴。因此，我国历代虽然都有关于岁时节庆的文献记载，但大多都仅以描述记载和概况梳理为主。如两汉前便有《礼记》《风俗通义》《四民月令》等，但它们都只是相对简略的记述。而南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是第一部系统地专门记述岁时节庆的文献，可以视为探索南北朝以前岁时节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清以降，则有《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而清代秦味芸的《月令粹编》更汇集了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并对节日进行了逐个介绍。^①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中国尚未出现系统的研究节庆文化的专著，但是随着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兴起，有关宗教祭祀、风俗活动等的研究，大量涉及了节庆文化内容。如钟敬文在谈到民族节日时，认为“民族民间节日不仅具有民族特点，体现着民族生活，而且有与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相伴随的意义，它也是诸多民族存在标志之一”^②。更重要的是，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意识到现代化与民族传统节庆文化之间的可能冲突，并提出了两种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是其内容的前瞻性和启发性，在当代社会对于我们却依然受用，因为其中心议题仍然是当今该领域的学者所需迫切回答的重要问题。

关于中国节庆文化的现代研究就此开启。与之对比，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特别是其中传统节庆文化的关注，可以说更早地在西方向全世界的扩张过程中就已经陆续展开了。早在16世纪中叶，传道士们便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而在其后的几百年间，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持续增长。节庆文化在其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照。具有代表性的，如法国学者葛兰言的经典名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便运用人类学社会整体性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诗经》中的古代节庆，试图揭示其中所蕴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与社会功能。葛兰言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在于，中国古代的节庆大多与宗教活动

① 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钟敬文：《民间节日与民族文化》，载《民族艺术》2008年第3期。

密切相关，与一个民族的核心生产生活方式直接相连。节庆文化并非只是自然环境或气候时令等外在因素在人类群体中的被动或“客观”反映，而是人类群体在特定生存环境、历史文化、生活实践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构建的产物。这就从理论上为传统节庆的持续流变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语言调查，并编纂成“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该丛书第一次系统性地呈现了中国各民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它们不仅填补了各民族在文化、艺术、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的资料空白，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各民族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面貌，还大量地涉及各族人民的传统节庆文化，以及这些节庆活动中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仪式活动、社会交往等丰富的文化要素，而且许多梳理和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随后的社会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包括节庆文化在内的调查和学术研究，也就在较长时间中被迫处于中断和停滞的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节庆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全面复苏和迅速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如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发起的，被誉为“文化长城”的十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便抢救、保存了大量的传统节庆文化资料。特别是 2003 年 3 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启动实施了旨在全面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系统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随着这一重大工程的有序推进，许多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以及少数民族的节庆活动如傣族泼水节、瑶族盘王节、苗族姊妹节等纷纷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相应的，节庆文化中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也通过类似工作的推进而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展现。

新的时代语境带来了节庆文化研究的新面貌。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随之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再次强大冲击，并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热潮。一批“节庆文化”书籍应运而生。当然，其中的绝大多数主要是根据古籍文献的记载，搜罗民间传说，经过整理汇编而成。它

们中的大部分带有相当浓厚的趣味故事色彩，以普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并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所以，学术研究所占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当然，它们也为该时期涌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寻根怀旧热潮作了一个脚注。

随后，关于节庆缘起的追溯占据了最引人瞩目的位置。如陈久金、卢莲蓉编著的《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一书，试图打破“把节庆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民俗学问题”的桎梏，提出了他们作为科学史工作者研究节庆问题的思路：正确科学地阐释节庆与天文历法的关系，而不是重复以往的思路——即遇到天文历算，就把神话传说与其联系起来，以便给节庆增添诸多神秘色彩。再如，范勇、张建世提出利用文化人类学宽广的视野和综合的方法来研究节日文化，并借用泰勒在分类学基础上给文化下的定义，为年节文化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进而，他们还拓展了节庆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因为节日中保留了“大量的外显传统习俗（诸如饮食、服饰、信仰、祭祀、文体体育等）和内隐的传统思想意识的变异”^①。所以，传统节日文化的实质应该被看作一个民族文化积淀、民族性格形成的主要场所。由此出发，甚至还可以通过观察节日中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探究该民族的内部凝聚力、向心力等问题。因此，这类研究极大地拓宽了节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如果说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节庆的起源方面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节庆的研究对象、方式乃至范式便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一方面，在该领域研究中，对各类传统节日的追根溯源至今仍在延续。人们力图找到充分的史料，经过严密的论证为某些节庆探源或正名。然而，当研究旨趣都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的时候，也常常会让人们在某些难以证实或证伪的地方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当那些介绍性的小册子的描述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理解和认识当代社会中的节庆急速变迁问题的诉求时，学者们便以丰富而多元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对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节庆文化的延伸性与关系性分析。如对节庆的社会运作与制度构建的把握，以及更多的对传统节日现代变迁的动力、

① 范勇、张建世：《中国年节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方式与影响等的探析。这一努力产生了一个积极成果，它使得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和阐释路径豁然开朗起来。

毋庸讳言，这样的推进是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翻译引介密不可分的。例如，德国学者约瑟夫·皮柏对节庆文化的研究，便从谈论整个世界和人生出发，去试图回答节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节日的欢乐性质在于它本身是难得的。只有基于平常工作日所塑造的生活为基础，才可能有假日的欢庆”^①。另外，他还颇具哲学意味地探讨了节庆对于人生实现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并在与节庆的关联性分析中指出，“一切的圆满都是透过对宇宙神圣领域的理解意识而实现的”。在此意义上，节日实质上应视为一种“富裕的表征”，而且这里的富裕并不是指物质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充裕，从而对功利社会没有真正的过节和休假的氛围进行了隐性批判。在国外相关理论的大量引入过程中，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传统节庆的研究也随之得到更多引介。如日本学者中村乔就在资料的翔实考证中聚焦中国的岁时节日，并从其变迁史入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创见。

在此转变的影响作用下，即便是同样阐释节庆的起源，学者们的分析也愈来愈趋向更具整体性的，多层次、多角度与多方法的结合。较有代表性的，如宋兆麟、李露露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节日文化》一书中论述了节庆的起源。他们认为中国的节日起源这个复杂的问题，是诸多因素如天文历法、人类的生育和婚姻形态、节日的艺术特征（包括祭祀纪念对象、节日仪式、相关饮食等），以及宗教信仰、禁忌、历史事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后代的节日风俗往往掩盖了远古的原貌，因此，必须分清历史层次，才能认识节日的来龙去脉”^②。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地区旅游业的长足发展，也让民族地区的岁时节庆文化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也

① [德] 约瑟夫·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页。

② 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相应地推动了更多的针对节庆文化的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等工作的全面发展。除了基础理论、各专门领域的长足进步之外，传统节庆的现代变迁、转型及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等问题，逐渐构成了当代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点领域。

其中，西南地区作为民族文化的富集区域，各民族的节庆文化既自成体系，即具有自身特殊的构成形态，同时又与更广泛区域的文化母体紧密联系，从而使之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质。而更值得重视的是，作为中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镇，该区域的传统民族节庆的现代化转变便尤具研究价值。

例如，黄泽便界定了西南民族节日的基本特质，即“以祭祀活动为主体，与农业、牧业、历法保持着松散的结合”^①。以此出发，他进一步分析了西南民族经济生产方式与节日形态的关系，并揭示了西南民族节日的深层内涵。在西南民族节日观念的多重性特征的阐述过程中，作者展开了从神话原型到群体归属，再到共同的心理素质逐步定型于民族节日观念中的逐层剖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当代民族节日所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强烈反差，即一改往常的循序渐进而发生迅速的跃升和剧变，作者还试图将文化变迁理论应用于民族节日的发展创新的分析之中，从而为其研究添加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

在该时期，注重研究对象的针对性，不仅把握整体，同时也开始强调问题意识和理论探讨的研究纷纷涌现。如杨昌儒、陈玉平主编的《贵州世居民族节日民俗研究》，便从宏观到微观，从纵向到横向，对贵州世居民族的节日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既有对一个民族地区节日的整体观照，也有对传统节日和现代节日、民族节日和法定节日间的互动关系的探讨，还有诸如跨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节日变迁的原因与取向，以及如何复兴民族传统节日等问题的阐述。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各门类的迅速发展，不仅传统节庆文化正在发生急速变迁，众多的新兴节庆更如雨后春笋般让人应接不暇。节庆文化本身也在空前的多领域关联拓展的进程中，其组成成分、要素正变得愈加复杂，而其性质、特征乃至本质也随之发生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这

① 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样，由某一学科统领的传统局面，显然已不能再支撑其在学术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上持续推进的可能。于是，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文化产业等学科，便纷纷涉足该领域，并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去重新探索这一既古老又全新的“文化处女地”。

学科的不断交叉和深度交流，为人们获得创新性的见地提供了可能，并为节庆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宽广的巨大空间。例如，赵东玉便从符号的角度，在历史、文化、语言等多学科交互的视野中，解说中国传统节庆与中国文化符号的互动关系。从节庆日期、节庆名称、节庆意蕴等方面，作者展开了对传统节庆这个中国人表现和传承自己文化理念载体的文化符号层面的阐释。如节日日期作为时光的关节，不但具有调节时序的意蕴，而且大多数节庆日期在读音上也有诸如“月内取中、年内对称、月日同数、重月之首日”等自然韵律特点，从而反映了中国人“竭力与自然形式韵律协调同步的内在精神追求”^①。同时，作者用大量的民俗资料论述了节日中的男女老少的角色位置和行为特点。如传统节庆中的男性角色通常是“家庭中的主人、社会的主宰”，而女性的角色是“生育本能之张扬、家庭职责之确认、社会角色之固定”，老人的角色是“备受尊敬的对象、节庆氛围的象征者”，儿童的角色则是“受教育的对象、被爱护的对象”等。^② 传统节庆文化由此让每个人都在期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和位置，从而维系其历经悠长历史而建立起来的传统。

而对节日时间框架的研究，同样是近年来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领域。如萧放在有关中国古代时令节庆等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人的时间体系可分为天时——围绕着太阳、月亮、季风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形成；人时——人们为了顺应自然时序的伦理意识、适应社会活动需要所创制的人文时间。不同于西方，中国人把时间看作是变化的、循环的，而不是物理的、线性的四季轮替。作为节庆文化根本框架的时间序列的认知差异，也就相应带来了中国和西方节庆在根底上的诸多不同。

① 赵东玉：《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② 赵东玉：《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43页。

时间框架不仅是节庆文化形式差异的根源之一，同时还与传统节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关。如高丙中在《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中指出，国家在管理节假日时间中的矛盾在于：法定假日没有配套的文化生活，而民间传统节日文化却没有法定假日提供的充足活动时间。因而，国家有必要承认传统节日在国家时间框架中的重要地位，给予其法定假日的身份，从而使官方纪念日和民间传统节庆同处于一个节假日体系之中。

来自学者、民众的大力呼吁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从2008年开始，包括清明、端午和中秋在内的三大传统节日，被国务院列为国家法定假日。政府的这一重大举措，引起了人们对传统节日当代文化处境的普遍高度关注。不仅学者们写下不少论文专著，民间也为此展开了延续至今的热烈讨论，从而再次把传统节庆文化热推向一个新高潮。节庆文化尤其是其现代变迁的理论研究，随之处于持续的拓展和深化的过程中。

其间，随着近年来全世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节庆现代变迁中的产业化现象及其相关问题，越来越凸显为人们聚焦的中心。实际上，从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节庆活动的经济价值便日益凸显。在此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节庆文化在自觉地或被迫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其间，大部分传统节庆的宗教、神圣意味日益减弱，而娱乐等功能却在不断地添加或强化，从而体现出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转变的总体趋势。

纵观当代我国较为大型的节庆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作为群众庆祝，强调娱乐功能；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一时期大多以工业产品为主，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第三阶段：始于世纪之交，经济发达地区开始承办国际性盛事，部分盛事开始选择二三线城市，普通民众接触国际级盛事的机会开始增加。^① 尤其是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

① 周勇：《我国节庆盛事活动发展回顾与未来展望》，载《旅游学刊》2009年第1期。

为代表的大型新型节事活动的举办，使得节庆产业的地位在国内快速上升，并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国内举办节庆的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增加，从区域分布来看，全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五大节庆经济产业带。第一，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华北节庆经济带”。第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华东节庆经济产业带”。第三，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华南节庆产业带”。第四，以武汉、郑州、成都、昆明等城市为龙头的中西部节庆中心城市。第五，以大连、哈尔滨等城市为中心的“东北边贸经济节庆产业带”。^① 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如陈忆戎从产业经济学产业构成的三个规定性理论出发，认为中国节庆产业的雏形正在形成，并日益明显地开始发挥其带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节庆业通过激励参节企业增加投入，即增加消费，从而促进服务链下游企业提高收入，进一步增加消费支出，循环往复，极大地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② 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对节庆的产业化运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如文江、孙萍编著的《节庆资本——看得见的赚钱机会》一书，就以大量的现实案例和调查数据说明，休闲时代的到来，将推动假日经济、旅游经济、会展经济、奥运经济等的快速发展。

在这段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整理节庆文化资源尤其是试图推动其产业化运作的册子丛书。它们的大量涌现，不仅体现出各地在保护和发扬自己的节庆文化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更集中表达了人们迫切希望通过节庆的产业化，来获取经济利益并推动地方社会发展的诉求。如《超越·崛起：广西民族节庆文化十大品牌》，便选取了十个广西民族民间独具特色、文化内涵丰富、可塑性强的个案，向读者展示了广西民族节庆产业化运作的潜力。

在这样的整体语境中，民族节庆产业化的开发研究迅速发展，由此引发的经验总结、概括及相关的理论反思也逐渐深入。如马肿炜在《民族文化资本

① 王春雷、赵中华：《2009年中国节庆产业发展年度报告》，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② 陈忆戎：《节庆产业与城市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